

## 參、社會

許志嘉、劉嘉恆

大陸社會發展正面臨 4 大挑戰：人口及就業問題嚴峻、資源和環境壓力巨大、世界經濟影響加深、消除貧困任務艱鉅。

大陸實際失業人口總計約 1 千 3 百萬，受影響家庭人數達 1 億 2 千萬，城鎮失業率為 8.9%，全社會失業率高達 25%。

中共持續鎮壓法輪功：將法輪功定位為「邪教」，3 萬 5 千名以上法輪功信眾被捕，多名法輪功幹部被判處重刑。

大陸當局持續鎮壓異議人士：4 名籌組中國民主黨人士被判處 5 至 11 年的重刑。

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城市居民貧困人口達 1 千 8 百萬。

大陸平均月薪最高城市行業是，深圳教育業的 3,513 元人民幣，濟南旅館業者平均月薪最低，僅 270 元人民幣。

大陸當局資料顯示，1999 年大陸洪水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約 344 億元人民幣，是 1998 年的四分之一。

大陸愛滋病感染者已超過 40 萬，成為西太平洋感染人數最多地區。

大陸當局發表「少數民族政策及實踐白皮書」，突顯其在疆、藏地區成就；積極「西部開發」，維持區域穩定。

中共漢族移民政策正威脅西藏文化；新疆貪污腐敗嚴重，影響其經濟發展。

### 一、整體社會情勢

1999 年整體大陸社會情勢基本上是屬於穩定的格局。由於 1999 年上半年是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10 周年，下半年又有「中共建政五十周年」及「澳門回歸」等大事，為了避免這些事件引起社會的不安，政治穩定是今年大陸當局面對社會情勢發展的最優先考量（陸建華，1999 年，p. 15）。在確保政治穩定的前提下，1999 年 4 月爆發的法輪功信眾包圍中南海事件，便犯了大陸當局的大忌，法輪功也成為大陸當局追求政治與社會穩定所必須排除的一道障礙。而大陸異議人士也仍然是大陸當局持續鎮壓的對象。

## 大陸社會發展的 4 大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當局追求的是以經濟建設為核心任務的發展策略。誠然，20 年來大陸經濟建設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但伴隨的社會問題也對社會穩定帶來了相當的威脅。1999 年 10 月 11 日，大陸當局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 1995 年聯合國社會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執行成果報告」中指出，當前大陸社會發展正面臨著 4 大挑戰：人口和就業問題嚴峻、資源和環境壓力巨大、世界經濟影響加深、消除貧困任務艱巨（「中國面臨四大挑戰」，大公報，1999.10.12）。

- （一）人口及就業問題嚴峻：報告表示，雖然採行一胎化政策，但大陸每年人口淨成長仍然高達 1 千 2 百萬人以上，人口素質低，人口明顯趨向老齡化，勞動人口每年增加 1 千萬。這些對經濟社會發展及資源保護，形成長期的巨大壓力。
- （二）資源和環境壓力巨大：大陸人均水資源、森林資源和礦產資源都低於世界平均水準，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又對自然環境產生大量的破壞，污染嚴重。大陸環境保護壓力極大，形勢極不樂觀。
- （三）世界經濟影響加深：隨著改革開放腳步的放快，大陸社會經濟受到世界經濟影響日深，亞洲、東歐及拉丁美洲一些國家經濟的負成長，使大陸出口難度增高。若大陸經濟成長速度因而放慢，城鄉居民與農民的收入成長會減緩，人民生活水準的改善也會減緩，對大陸社會的穩定有不良影響。
- （四）消除貧困任務艱鉅：大陸農村尚未擺脫貧困人口，呈現區域化及零散化的特徵，解決溫飽問題的難度，遠比大陸當局想像中大，且剛脫離貧困的人

口，因收入低且不穩定，隨時可能陷入貧困。

從大陸當局的官方報告來看，當前大陸整體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在於：人口、就業、環保與貧窮。人口及貧窮問題，一直是大陸當局的困境，長期以來都難以解決，一胎化和改革開放政策仍無法有效解決，這些長期以來積累的問題。至於就業和環保問題，則是隨著大陸當局解決貧困問題所推動的經濟改革路線而來，特別是隨著改革力度的加大，就業問題日益嚴重，就業問題若無法完善解決，對大陸社會穩定將是一大影響。

### 2000 年大陸整體社會情勢預測

去年大陸社會情勢，基本上是取得了穩定的發展。展望今年大陸社會情勢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籌組的「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經由實地考察、問卷調查及統計分析等方式，撰寫的「1999-2000 年社會藍皮書：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一書，對 2000 年大陸的社會情勢發展提出預測，具體重點包括（大陸情勢雙週報，1999.12.8）：

- (一) 2000 年，小的、局部的矛盾會相對增多，但總體形勢保持基本穩定，改革、發展所需的良好環境能夠得到保持。
- (二) 失業人數增加、收入差距擴大、吏治與司法腐敗、農民負擔過重等，是對大陸社會穩定的潛在挑戰。
- (三) 大陸當局黨政部門將更加強調和重視社會穩定。
- (四) 懲治腐敗、打擊經濟犯罪，以及對「邪教」的防範和鬥爭，會更清醒、更警覺、更有力。
- (五) 下崗再就業問題，會被更加重視，但隨著機構改革的深化，大陸下崗分流人員還會增加，社會壓力增大，解決再就業任務艱巨。

從報告的預測來看，2000 年大陸社會的失業、貧富差距、貪污腐化及農民問題，仍然是大陸當局所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事實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 年初出版的大陸社會藍皮書，對 1999 年大陸社會情勢的預測分析中，已指出了農業、下崗及貪污腐敗問題的嚴重性（陸建華，1999 年，pp. 15-17）。但 2000

年的預測，不但舊問題未解決，且新的問題，如貧富差距擴大、宗教組織等問題又再增加，雖然報告強調大陸社會仍會維持基本的穩定，但這些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勢必是大陸當局所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也是觀察大陸當局政權是否能夠持續的重要指標，值得密切觀察、深入分析。

## 二、失業問題

隨著大陸當局「國企」改革速度的加快，下崗問題日趨嚴重，近年來全大陸城鎮突發性的、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已被大陸學者專家形容成為二十一世紀大陸當局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國家計委」公布的「發展計劃報告」中指出，1998年大陸「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3.5%左右」。然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分析室主任」胡鞍鋼最近的研究報告估計，1998年大陸城鎮實際失業人口（指登記失業人口、下崗失業人口和農民工失業人口三者合計），約1千5百40萬至1千6百萬，失業率約8%；鄉鎮企業就業人數比上年減少1千7百萬人，兩者合計，大陸失業人口總數達3千2百萬至3千3百萬人（胡鞍鋼，「迎接失業挑戰的7點建議」，大公報，1999.11.8）。失業人口影響所及的家庭人數更高達1億2千萬人，達大陸總人口的十分之一（聯合報，1999.11.8）。

胡鞍鋼的研究反映出，大陸當前下崗與失業問題之嚴重，遠超過大陸官方的統計數字。不過，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偉的估計，比胡鞍鋼的估計更為悲觀。劉偉認為，目前大陸的失業登記率為3.5%，下崗職工約佔城鎮勞動力7.4%，兩者合計為10.9%；企業冗員率至少有20%，約2千萬人，提前退休職工約3百萬人，兩項合計2千4百萬，此兩項隱性失業率約13%；隱性就業（下崗職工和提前退休人員的隱性就業）約9百多萬，佔城鎮勞動人數的5%。前項數據合計，大陸城鎮的實際失業率約19%，如果再加上農村勞動力的實際失業和隱性失業，則大陸全社會失業率高達25%以上（「來自中國失業問題的社會解讀」，香港大公報，1999.9.19）。

胡鞍鋼的研究並不考慮隱性失業和隱性就業，劉偉認為，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的計算方式，應該是登記失業人口，加上下崗職工總數，減去下崗職工中已重新就業之人員，再加上城鎮中農村勞動力失業人口。在這樣的計算基礎上，劉偉推

算出 1999 年，大陸城鎮失業人員為 1 千 5 百至 1 千 8 百萬人，失業率為 8.9%（「來自中國失業問題的社會解讀」，香港大公報，1999.9.19）。「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研究員莫榮，以類似的方式計算，推算出的 1999 年失業人口數字則是 2 千 2 百萬人（「來自中國失業問題的社會解讀」，香港大公報，1999.9.19）。

推估的數據或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陸下崗與失業問題已相當嚴重，實際失業率已經接近兩位數。大陸官方一項研究結果也預測，大陸城鎮失業和城鄉不充分就業將達到 1 億 5 千 3 百萬人，失業率達 21.4%（楊宜勇等著，失業衝擊波——中國就業發展報告，1997，p.49）。依據國際社會經驗，一旦失業率攀升到一定水準，就會出現很難再下降，就是所謂的「滯後效應」。無怪乎胡鞍鋼將大陸失業問題比作洪水，且認為，這種失業洪水比自然災害對大陸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所造成的衝擊和影響更為廣泛、更為長久、更為痛苦（胡鞍鋼，「迎接失業挑戰的 7 點建議」，大公報，1999.11.8）。

## 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分析

1998 年大陸經濟成長率雖然達到 7.8%，但全大陸新增加的就業機會只有 357 萬人，就業成長率僅為 0.5%，是中共建政以來最低的成長率（胡鞍鋼，「迎接失業挑戰的七點建議」，大公報，1999.11.8）。大陸學者估計，在大陸「國」有企業下崗職工，軍隊精簡後的勞動力，政機構改革即將開始，軍隊武和政府機關不得經商等因素所增加的勞動力，再加上新進入勞動市場的青年大軍。1999 年大陸新增加的勞動力供給總量為 2 千 8 百 40 萬人，但全社會增加的就業機會不超過 6 百萬個。此外，大陸農業尚有 1 億 3 千萬富餘勞動力需要就業，城鎮用人單位約有 2 千萬富餘勞動力，總計城鎮與鄉村地區大約還有 1 億 5 千萬左右的富餘勞動力（「來自中國失業問題的社會解讀」，香港大公報，1999.9.19）。

從勞動力的供給面與需求面來看，大陸勞動市場供應的嚴重不平衡，將使失業問題進一步惡化，龐大的剩餘勞動力，更是失業的潛在人口。失業問題確將成為大陸社會不穩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下崗職工主要分布在東北和中西部的 10 個省份，僅東北 3 省的下崗人數便佔全大陸總數的 23.9%。就行業分布來看，紡織、煤炭、軍工、機械等行業的下

崗職工較多（「來自中國失業問題的社會解讀」，香港大公報，1999.9.19）。從這些數據來看，不但勞動力供需嚴重失衡，且大陸下崗職工的地區和行業分布也出現失衡狀況，中西部原本就比較貧困，再面臨失業的壓力，恐將造成大陸當局的隱憂。

### 解決失業問題的方案

失業問題已成為大陸社會不穩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為了因應失業問題，大陸學者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胡鞍鋼提出 7 點建議：(1) 實行就業導向的成長策略，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2) 促進私營和個體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3) 進一步開放服務業市場，積極吸引外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4) 實施有利於就業激勵政策和促進勞動力市場流動性的政策；(5) 切斷就業人員與社會服務之間的聯繫；(6) 鼓勵非正式部門的發展和非正規就業；(7) 政府轉變財政援助對象，大幅度提高失業人員和城鎮貧困人口補助金標準（胡鞍鋼，「迎接失業挑戰的 7 點建議」，大公報，1999.11.8）。

## 三、群眾抗爭

雖然大陸當局嚴格控制傳播媒體的訊息傳遞，但層出不窮的大陸群眾抗爭事件仍然時有所聞。這些群眾抗議事件主要都與下崗及失業問題有關，失業問題已明顯衝擊到大陸社會的穩定發展。

大陸群眾抗爭事件的主要案例包括：

10 月 8 日，四川省攀枝花市爆發警民衝突，2 千多名群眾因不滿當地警察拒絕受理案件，引發抗議事件，約 40 位民眾在衝突中嚴重受傷。這場衝突的起因是，當地一名市民被 3 名流氓追殺，逃到警察崗哨救助，但卻被公安趕走，而被流氓殺傷，群眾獲知消息後，便湧到警崗理論，聚集的群眾超過 2 千人，並與馳援的警察人員發生衝突（聯合報，1999.10.10）。

11 月 2 日，陝西省渭南市紡織廠約 1 千名工人，因為不滿工廠在倒閉後，沒

有適當安排生活費，因而走上公路示威。渭南紡織廠因為領導人經營不善並涉及貪污，以致工廠倒閉，工廠被拍賣後雖獲得 4 千萬人民幣，但失業工人卻未獲補償，1 千名工人遂圍堵渭南市 3 條主要道路示威抗議（中央日報，1999.11.6）。

11 月 19-24 日，超過 280 名的北京一家百貨公司下崗工人，分批躺在公司一樓進行示威抗議。這些工人因為百貨公司生意不佳，因而被迫下崗，他們便分批躺在百貨公司一樓抗議，要求公司發給補償金代尋工作（星島日報，1999.11.28）。

11 月 26 日，長沙市湖南橡膠廠 200 名下崗職工，因為發放生活補助費問題與工廠發生爭議，而上街頭示威抗議。200 名下崗職工因為不願意與廠方簽定進入下崗再就業中心協議，又要求廠方發放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補助費，與廠方未能達成協議，因而引發示威事件（大公報，1999.11.28；香港文匯報，1999.11.28）。

從這些示威抗議事件可以發現，龐大的下崗職工安置與再就業問題，已經成為大陸社會不安定的重要根源，多數抗議事件皆肇因於未能妥善處理，下崗工人已為大陸社會的不定時炸彈。大陸失業人口的壓力確實已經對社會的安定帶來重大的衝擊，如果未能妥善因應，中共政權恐怕會受到更大的衝擊。

## 四、宗教問題

繼 7 月 22 日「公安部」宣布法輪功為非法組織後，大陸當局進一步將法輪功定為邪教，加以取締。不但持續透過大陸各種傳播媒體宣傳法輪功為邪教，同時，還以實際行動進行取締工作。

### 將法輪功定為邪教組織

10 月 28 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特約評論員的文章「『法輪功』就是邪教」，文章將法輪功從過去所指控的非法組織，進一步界定為邪教（人民日報，1999.10.28）。10 月 30 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使大陸當局取締法輪功、逮捕法輪功幹部與信眾，取得了

法律上的依據。同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為處置法輪功提供了法律適用的依據。10月3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檢察機關發出「關於認真貫徹執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的通知」，下令各級檢察機關加速查辦法輪功幹部與信眾（大陸經濟日報，1999.11.10）。

大陸當局將法輪功界定為「邪教」後，仍然持續加強從傳播媒體及文宣部門的管道，對法輪功大加撻伐。同時，更將對付法輪功的策略，從文攻進一步推升到具體的處置行動階段，透過立法機關賦予取締法輪功的法律依據，取得法理依據後，開始展開逮捕與判處重罪的實際處置行動。

### 逮捕法輪功成員並判處重刑

根據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表示，「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 11月26日在一場於北京舉行的大會中透露，大陸當局有關部門從7月20日至10月30日，3個月內，僅在北京就至少逮捕了3萬5千多名上訪的法輪功成員。其中，僅7月20日至7月22日大陸當局正式宣布法輪功為非法組織3天內，就逮捕了2萬人；10月25日至10月30日，將法輪功正式界定為邪教的期間，也逮捕了4千2百多人；10月30日以後，每日仍持續逮捕60人以上，11月14日至17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訪問大陸期間，被捕的人數最多（星島日報，1999.11.30）。

針對這項說法，「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局局長」錢小芊表示，外傳3萬5千7百90名法輪功練習者被捕一事，可能是指7月份以來，企圖在北京公共場所搞非法聚集，被勸離或帶離現場的人次數。他只承認，至11月22日止，「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的法功練習者共有150餘人，其中被提起公訴的共44人（香港文匯報，1999.12.3）。

由於法庭審判手續繁雜，且易引起外國媒體注意，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表示，大陸當局主要採取判處勞動教養方式，來處置法輪功成員，僅河北省一地，至少就有500名法輪功成員會被判勞教。此外，北京部分公安單位，還以每名500

元人民幣的價格，懸賞舉報法輪功成員（星島日報，1999.11.8）。

在大陸當局雷厲風行的執法行動下，1999年11月12日，海南法輪功幹部宋岳勝、陳元、江詩龍、梁玉琳，被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等罪名，分別判處12年、7年、3年和2年的有期徒刑，成為第一批被大陸當局判刑的法輪功成員（中央日報，1999.11.13）。此後，大陸各地陸續傳出法輪功成員被起訴或被判勞教的消息，總計大陸各地被判勞動教養的法輪功成員已超過3000人（法國之聲，1999.12.27）。

4名早在10月19日便被大陸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的法輪功幹部，被控以「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非法獲取國家秘密」、「非法有國家絕密、機密文件、資料」、「故意洩露國家秘密」及「非法經營」等罪名的李昌、王治文、紀烈武、姚潔4人，原定於12月3日進行審判，因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外聚集數百名法輪功學員，審判被迫宣布延期（中央日報，1999.12.4）。

12月26日，北京中級人民法院以「利用邪教組織致人死亡和非法獲取國家機密」罪名，將李昌、王治文、紀烈武、姚潔，分別判處18年、16年、12年及7年的重刑。指他們追隨法輪功創始者李洪志志，違法建立法輪功，在各地設立39處法輪功輔導總站，1千9百個輔導站，2萬8千個練功點，4人並策劃1萬名法輪功練習者，於1999年4月25日，到中南海周圍聚集、靜坐示威（中國時報，1999.12.27.14版）。

大陸當局對4人判處重刑後，引起美國方面的強烈反應，白宮特別發表簡短聲明，表示對此判決深感遺憾，並敦促大陸當局遵守已經簽署的人權公約，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法國廣播電台，1999.12.28）

這4名法輪功幹部被判處重刑案之所以特別受到注目，主要原因是，4人都是中共黨員及幹部。紀武烈是大陸有色金屬總公司駐香港總經理，係鄧小平女婿吳建常的助手，李昌是原「公安部計算機局副局長」，王治文是「鐵道部」物質總公司工程師，姚潔則是北京某大地產公司黨委辦公室主任（星島日報，1999.12.4；法國之聲，1999.12.27）。

## 擴大鎮壓宗教團體

除了加強對法輪功的鎮壓、取締行動外，大陸當局還藉機擴大鎮壓相關的氣功及宗教組織。10月21日，「國家體育總局」、「民政部」、「公安部」聯合發出，「關於加強健身氣功活動管理有關問題意見」的通知，通知要求，「堅決取締非法氣功組織」(香港文匯報，1999.10.22)。

10月27日，四川成都公安機關以涉嫌非法經營罪名，逮捕成立「中國自然特異功研究會」，被稱為「國功」組織的主要幹部劉繼能、劉軍，其他幹部也被判處勞動教養(香港文匯報，1999.10.28)。

11月初，大陸當局對另一個具宗教色彩的氣功組織「慈悲功」展開鎮壓行動，逮捕慈悲功首腦蕭鄖(中央日報，1999.11.3)。此外，10月初便被大陸當局鎮壓的另一個號稱擁有2千萬成員的氣功組織「中功」，繼基地被查封後，12月2日不願遷離該基地的成員又被迫解散(中央日報，1999.12.5)。

除了對大陸各地所謂「邪教」組織加強鎮壓之外，大陸當局也不放棄加強對其他宗教的控制。梵蒂岡天主教會所屬的費茲通訊社透露，一份1999年8月16日完成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秘密文件顯示，中共企圖藉大陸教區主教任命權，換取教廷外交承認，但為防範建交後，教廷取得大陸天主教的控制權，大陸當局將在與教廷建交後，全面整肅大陸地下天主教會(工商時報，1999.11.11)。

從大陸當局加強鎮壓法輪功的行動可以發現，去年4月爆發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事件後，大陸當局經過近3個月的籌劃，第一階段首先在7月22日發難，將法輪功定為非法組織，展開大規模的文宣批判，同時逮捕法輪功幹部及成員。接著第二階段於3個月後的10月30日展開，大陸當局將法輪功定位為邪教組織，同時通過法令，使取締法輪功的行動得法理上的依據。

這種兩階段式的鎮壓行動，一方面可減輕號稱近億信眾的法輪功成員的反抗，另一方面可以凝聚大陸當局的鎮壓力量，先文攻威嚇一般成員，同時逮捕主要幹部殺雞儆猴；接著再通過法令，將整個鎮壓行動合法化，再把最後一批「頑固份子」逮捕入獄，逐漸縮小打擊面，把可能「撼動」中共政權的法輪功個個擊破。

## 五、人權

雖然中共「建政 50 周年」敏感時刻已過，大陸當局也升高對法輪功的鬥爭，但大陸當局仍然未放鬆鎮壓異議人士的行動。

### 重判籌組中國民主黨異議人士

杭州「中級人民法院」10月25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審判籌組中國民主黨的4名異議人士吳義龍、朱虞夫、毛慶祥和徐光，11月9日，4名異議人士分別被判處重刑，吳義龍被判處11年徒刑，朱虞夫被判刑8年，毛慶祥被判7年徒刑，徐光則被處5年徒刑（[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999.11.10）。自從大陸當局1998年11月簽署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大陸異議人士1998年6月籌組「中國民主黨」以來，至少已有18名籌組中國民主黨的異議人士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重刑，超過400名異議人士曾被拘捕（[中央日報](#), 1999.11.29）。

除了4名異議人士被判處重刑外，10月8日，湖北省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將要求平反「六四」的大學生袁擁波判刑徒刑1年（[星島日報](#), 1999.10.9）。

10月15日，山東異議人士孫維邦，到北京探望知名異議人士徐文立時，被當地公安逮捕（[中央日報](#), 1999.10.18）。

11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審判知名異議人士江棋生。（[星島日報](#), 1999.11.2）

### 拒絕異議人士小孩登記出生證明

一名曾經參與籌組「中國民主聯盟」的大陸異議人士夏必光（譯音），其妻於北京醫科大學第三醫院生產後，該院未說明任何理由情況下，拒絕發給其於1999年9月3日出生的小孩的出生證明（[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999.10.23-24）。

大陸當局在推動經濟改革的同時，對於政治改革方面一直沒有較大的行動，特別是在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政治異議人士一直是大陸當局施壓的對象，即使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大陸當局仍然沒有放鬆對政治的控制。

## 六、人民生活

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一部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大陸經濟的成長，也改善了許多人的生活，大陸當局官方資料顯示，1978年大陸農村貧困人口有2億5千萬人，1998年已減少到4千2百萬人（鄒劍倫，「中國城市貧困現狀」，大陸經濟日報，1999.10.27）。這樣的統計數據雖仍有爭議，但大陸農村貧困人口確有減少。只是，農村貧困人口雖減少，但城市貧困人口仍多，總體而言，貧窮仍是大陸當局所必須克服的難題，更重要的是，當貧困問題仍未落實解決之際，大陸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卻已經浮現檯面。

### 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除了龐大的農村貧困人口外，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城市貧困人口問題也日益嚴重，形成了「新貧困群體」的現象。依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1997年大陸城市貧困人口約1千1百68萬，但大陸學者專家的估算則認為，城市貧困人口約在1千5百萬至1千8百萬人之間（鄒劍倫，「中國城市貧困現狀」，大陸經濟日報，1999.10.27）。這些困居在大陸各大城市的貧困人口，對長期以來，一直以犧牲農村居民權益，來保障城市居民利益的大陸當局而言，已成了社會不穩定的重要根源。

「國家統計局」資料發現，大陸城市「新貧困群體」有下列3個特徵：(1)地區差異性顯著，1997年城市貧困人口中，85.5%，約997萬人，居住在落後的中西部地區；(2)貧富收入差距過大，1997年城市居民10%最高收入戶人均收入，是10%最低收入戶的4.2倍；(3)行業性特點明顯，紡織、煤炭、機械等傳統產業職工，占貧困人口的比重較大（鄒劍倫，「中國城市貧困現狀」，大陸經濟日報，1999.10.27）。

大陸貧富差距過大已是明顯事實，且根據大陸學者專家的研究，大陸高收入戶人均收入的成長幅度維持高成長，但低收入戶人均收入卻出現負成長，顯示大陸貧富差距問題仍將持續擴大（唐鈞，1999年，p.404）。

另據「國家統計局經濟景氣監測中心」等單位，針對大陸北京、上海等20個城市及近郊農村的居民，所進行的「1999中國市場與媒體研究」調查結果也發現，大陸居民貧富差距呈現兩極化趨勢，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一部分消費者

的收入持續成長，一部分消費者的收入則減少（工商時報，1999.10.16）。

貧富差距日益嚴重，對高舉社會主義旗幟的大陸當局領導人而言，無異與當年革命時所追求的社會平等理想背道而馳。貧富差距的擴大，不但意味著貧困人口可能造成社會問題，也凸顯了社會不平等可能帶來的衝擊，更威脅了共產黨的合法統治基礎。

### 施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

隨著中共「十五大」中所標榜的加深國企改革力度的政策推展，大陸「國企」下崗職工問題，不僅增加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的難度，也對城市貧困居民的增加帶來了壓力。為了避免城市貧困居民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大陸 10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大陸經濟日報，1999.9.30）。

這項被大陸官方稱為社會保障體系「最後一道安全網」的生活保障條例，旨在提供大陸低收入戶及下崗職工最低生活保障的社會福利，同時落實大陸當局推動國企改革對下崗職工提出的「3 條保障線」制度（一是下崗職工由再就業中心保障其基本生活；二是進再就業服務中心 3 年後仍未就業，轉到社會保險機構領取失業保險金；三是享受失業保險金 2 年後仍未就業，再轉到「民政部」享受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事實上，早在 1999 年 1 月，大陸當局就已經開始實施相關措施，總計 1999 年 1 月到 9 月，大陸當局已發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達 15 億人民幣。截至 10 月底，大陸已有保障對象 281 萬 7 千人，其中，原有的「三無人員」（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人和撫養人的人員）占 21%，在職、下崗、失業人員等占 79%（人民日報，1999.11.27）。

從大陸官方具體統計資料來看，「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最主要是把下崗職工納入這套「最後安全網」體系，下崗職工占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人數的絕大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迄 1999 年 10 月底，納入這項保障的不到 300 萬人，與 1 千 8 百萬的城市貧困人口數相較，大陸當局對貧困人口的保障行動，仍然有待加強。

對龐大的大陸貧困人口而言，城鎮貧困人口生活水準相當低，但至少受到大陸當局較多的保障，對更龐大的農村貧困人口與流動人口（俗稱盲流）而言，由於城

鎮貧困人口會對大陸當局表達不滿，大陸當局會優先解決他們的問題（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9.10.21），前述保障條例便係顯例。扶貧問題仍然是大陸當局必須設法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而廣大的流動人口（學者估計約達 1 億）。更是大陸社會的不定時炸彈，對大陸社會的穩定形成潛在的隱憂。

## 消費行為與生活

貧富差距問題的擴大，一方面凸顯大陸貧困人口問題的嚴重性，另一方面則顯示，一部分富有的大陸城市居民消費能力的增加。

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及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所作的調查結果顯示，20%的大陸城市居民持有銀行的信用卡，持卡人中，9%每周使用 1 次以上，24%持卡人每月使用 2-3 次，67%的持卡人每月使用 1 次或更少。以各大城市相比，福建省福州市 64%居民持有信用卡的比率最高，昆明次之，58%，上海再次之，43%，北京居民則只有 30%持有信用卡（香港大公報，1999.10.27）。

這項調查結果顯示，大陸城市居民消費型態的改變，以及消費能力的增強，大陸城市居民消費能力已逐步提升，有能力進行更多、更高品質的消費。一項針對上海市民的調查結果顯示，在一胎化政策的影響下，子女消費已是大陸家庭支出最重要的因素，72.94%的家庭認為，子女消費是必須保障的家庭消費；而上海地區 0-12 歲兒童，每人每月消費平均值更高達 736 元人民幣（上海文匯報，1999.11.1）。

前項調查結果凸顯了大陸城市居民消費能力的大幅提升，同時也印證了大陸貧富差距擴大問題的嚴重。與城市和農村地區一般人民的收入相比，上海地區兒童每月 736 元人民幣的消費，就已遠超過許多大陸城市職工的月薪，更不用提廣大農村地區收入偏低的農民。

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針對大陸 10 大城市進行的行業平均薪資調查結果顯示，大陸城市平均月薪收入最低的是濟南旅館業者的 270 元人民幣（工商時報，1999.9.24），與上海兒童相比，3 名濟南旅館業工作人員的月薪才足以供應 1 名上海兒童的消費支出。

依據前一項調查，大陸城市行業平均月薪最高的是深圳的教育業者，平均月

薪是 3,513 元人民幣。調查顯示，深圳職工平均薪資在大陸屬於較高的城市，深圳最低平均月薪行業是化學工業，月薪達 1,402 元人民幣，而濟南市平均月薪最高的行業郵電通信業，月薪僅 1,087 元人民幣（工商時報，1999.9.24）。

北京市最高月薪行業是印刷業的 2,342 元人民幣，最低是金屬製品業的 651 元人民幣。至於上海市，最高月薪行業是金融業，平均月薪為 1,952 元人民幣，最低月薪是紡織業的 746 元人民幣，上海紡織業者的平均月薪，僅勉強足以支應上海兒童的月消費。

根據財富雜誌公布，蓋洛普公司對大陸人民的消費態度和生活方式所作的調查顯示，大陸城市與農村生活仍有相當大的差距。調查結果指出，96%的城市居民擁有彩色電視，但只有 39%的農村居民擁有彩色電視；78%城市居民擁有電話，只有 14%的農村居民擁有電話；有行動電話的城市居民占 28%，農村居民擁有行動電話的則只占 2%（上海文匯報，1999.10.6）。

前項調查也發現，大陸城市居民每年開支中占最大比率的是食物，占消費支出的 39.2%，其次是 15.9%的儲蓄，娛樂旅遊只占 6.8%，顯示大陸城市居民支出仍是「民以食為天」，以食物支出最多。至於儲蓄最主要的原因，依序是醫療保障 65%，教育投資 63%，養老 61%。

此外，在國際市場前景看好，勢將成為未來市場主流的網際網路運用方面，大陸城市地區居民使用過網際網路的人只有 8%，農村地區居民更低於 0.5%。顯示大陸民眾對網際網路使用率偏低，對大陸未來國際競爭力，將是一項重大的挑戰。

## 七、水患與環保問題

1999 年大陸又出現洪水威脅，雖然整體損害沒有去年嚴重，也已渡過洪水期，但環保、貪腐等基本問題若未能徹底解決，洪水仍將是大陸當局與大陸人民，年年夏天都必須面對的嚴竣考驗。

## 長江「姊妹水」災情較去年輕

大陸長江 1999 年出現連續兩年洪水的「姊妹水」，雖然部分地區水位比 1998 年高，不過，整體而言，與 1998 年相比，1999 年大陸長江幹堤險情數量減少，險情程度也轉輕，損害比去年減輕。

依據大陸當局資料顯示，1999 年大陸洪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為 344 億元人民幣，是 1998 年損失 1 千 3 百 45 億元人民幣的四分之一；1999 年投入防洪工作的人數是 377 萬人，約為 1998 年投入防洪人數 670 萬的二分之一；1999 年動用解放軍和武警搶救災情的人數，則是 1998 年的十八分之一；1999 年消耗的各種搶救物資，約為 1998 年的六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人民日報，1999.10.11）。

1999 年大陸洪水災情減緩，與大陸當局 1998 年遭遇特大洪水造成龐大經濟損失後，積極投入防洪工程與推動相關措施有重大關係。1998 年洪水過後，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移民建鎮」等治水戰略，疏浚河道 1500 多平方公里。大陸當局並加強治水工程，從經濟效益來看，1998 年冬投入水利工程產生的直接經濟效益超過投入的 10 倍（人民日報，1999.10.11）。

從大陸當局公布的數字與解釋來看，環保問題確是大陸水患連年的最主要原因，一味追求經濟成長，卻未能做好水土保持工作，使得大陸湖水面積大幅縮減，降低了蓄洪量。資料顯示，1949 年，長江中下游通江河湖面積為 1 萬 7 千 1 百零 8 平方公里，目前只剩下洞庭湖及鄱陽湖兩大湖，總面積僅 6,000 平方公里，有「千湖之省」稱號的湖北省，目前只剩下 300 個湖泊（人民日報，1999.10.11）。

雖然為了緩解大陸水患的威脅，大陸當局去年疏河道 1,500 平方公里，但與這 50 年來失去的 1 萬 1 千多平方公里湖面相比，大陸當局對於長江河水湖泊的整治，沿岸環境保護工程的加強，仍然有待提升。

## 環境污染嚴重，每年損失 2 千 8 百 30 億元人民幣

大陸一支科學考察採訪組，花了 3 個月時間，完成長江源頭格拉丹冬雪山到上海長江入海口的全程考程後發現，長江生態環境已遭到嚴重破壞。保護水源，已成為事關民族生存發展的當務之急（大公報，1999.10.12）。

這支考察隊的研究，對長江生態環境變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後，得到下列重要的發現（大公報，1999.10.12）：

- （一）長江源頭正逐漸乾枯，沱沱江年水流量 10 年中，下降了約 20%。
- （二）沱沱江，通天河流域乾化、沙化、荒漠化問題日益嚴重，草場退化，20 年中，江源地區荒漠化的面積增加了 20% 以上。
- （三）風沙已威脅到金沙江流部分地區。
- （四）金沙江流域水土流失極為嚴重，金沙江全長 2308 公里，兩岸的泥石流溝就有 1,100 多條。
- （五）長江中、下游湖泊容量少了約一半，長江成了「直腸子」，調節水量能力減弱。

考察隊的發現，凸顯了長江生態破壞問題嚴重，也說明了長江連年水患的重要原因。考察隊認為，做好環境保護，是拯救長江生態最重要的方法，他們建議應退牧還林場，保護江源地區水源，停止砍伐天然林木，鼓勵投資生態環保產業，調整長江上游農牧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為生態旅遊。

長江水患嚴重，凸顯的是生態的破壞問題，但困擾大陸環保問題的還包括水質污染與大氣污染。依據大陸官方對大陸 7 大水系長江、黃河、松花江、珠江、遼河、海河、淮河和太湖、巢湖、滇池的監測結果顯示，這些河流湖泊有 63.1 % 的水質屬於重污染和嚴重污染，已失去了飲用水的功能。空氣污染方面，大陸北方城市大氣中降塵和顆粒濃度 100% 超過安全標準，南方城市則有 50-60% 超過安全標準，冬季的污染則更加嚴重（光明日報，1999.11.22）。

嚴重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不但威脅大陸的生態安全，對大陸社會發展也帶來直接的經濟損失。依據估算，大陸每年由於水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約 5 百億元人民幣，因大氣污染而造成的損失約 2 百億元人民幣，因自然災害引起的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約 2 千億元人民幣，固體廢物排放引起的土地、水及空氣污染損失，約 1 百億元人民幣，噪音污染造成的損失約 30 億元人民幣。總計大陸因環境污染與自然災害所引起的生態破壞，每年造成的損失達 2 千 8 百 30 億元人民幣（香港大公報，1999.11.14）。

面對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大陸當局並非毫無反應，大陸媒體時常探討此問題，大陸當局也撥發預算、訂定政策，進行整治，但問題仍然未獲解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各級幹部不重視環保問題。1999年11月27日，「廣東省政府」在一份報告中便承認，1995年至1998年，廣東省徵收的10億1千4百萬元人民幣排污費，原本應使用於治理污染，但該省卻將款項總額的五成二，也就是超過5億元人民幣的經費，挪用於補充行政費、建辦公樓和宿舍、購買交通工具及通信工具等（大公報，1999.11.28）。

大陸當前環境污染問題已相當嚴重，大陸當局必須特別重視。然而，環保問題不只是政策的重申，更需要的是觀念的改變，如果大陸當局仍以經濟發展為最優先考量，那麼，各級政府部門必然仍會為了發展經濟，或當前的短期利益，而犧牲其他問題，環境與生態保護仍是大陸當局必須努力推動的課題。

## 八、醫藥健康

### 愛滋病感染人數超過 40 萬

「衛生部」於12月1日世界衛生日宣布，大陸愛滋病感染者人數已超過40萬人，感染人數高居西太平洋地區第一位，在亞洲地區僅次於印度、泰國及緬甸，居亞洲第四位，在世界居第二十七位（新華社，1999.12.1；香港文匯報，1999.12.3）。

大陸官方資料顯示，大陸愛滋病患主要分布在農村，經吸毒感染者占71.7%，30歲以上的感染者占67.3%，感染者的男女比例是5.3：1，1999年前3季愛滋病感染報告人數，比1998年同期增加了33.3%（人民日報，1999.11.16；新華社，1999.12.1）。

針對日益擴大的愛滋病感染問題，「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表示，愛滋病主要的感染途徑吸毒和性亂人口，在大陸都大量存在，每年還有上億的流動人口、上百萬的服務小姐和賣血人員，使大陸預防愛滋病和性病的任務更加艱鉅複雜（新華社，1999.12.1）。針對愛滋病感染問題，專家警告，雖然與全球高達5千萬的感染者相比，大陸愛滋病患並不多，但若不採取有效防範措施，新世紀的大陸將會有1千萬名愛滋病感染者，成為全球愛滋病的重災區（香港文匯報，1999.12.3）。

面對愛滋病的擴大感染，大陸當局必須正視此一問題，除了大陸吸毒人口

多、性亂人口多、流動人口多、性服務業人口多、賣血人口多等愛滋病潛在感染機會大之外，大陸防治機構及防治觀念仍然不足，是大陸當局更需面對解決的問題。

### **吸煙人口眾多：男性 3 億，女性 2 千萬**

大陸吸煙問題相當嚴重，根據美國一民調機構，對大陸 12 萬名 16 至 69 歲居民進行的吸煙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大陸男性煙比例高達 60%，女性為 3.8%。吸煙人口中，有 3 億是男性，女性吸煙人口是 2 千萬，平均每人每年消耗的香煙量是 1,900 支，吸煙人口的收入中，25%用於購買香煙。1984 至 1996 年，大陸吸煙人口的平均年齡下降了 3 歲（法國廣播電台，1999.10.6）。

## **九、少數民族**

### **大陸當局發表「中國少數民族政策及其實踐白皮書」，海外宣傳意味濃**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及其實踐」白皮書，內容分從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堅持民族平等團結、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促進各民族共同發展及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文化等部分，為其在少數民族工作的成果作統戰宣傳外，亦宣示其持續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發展之決心。

「白皮書」中引用大量統計數字證明，凸顯大陸當局在疆、藏地區成就，惟未述明未來政策走向。在近期國際的「科索沃事件」及「東帝汶事件」，突顯後冷戰時期「人權議題」在國際政治發展新趨勢；及海外勢力積極支持疆、藏獨組織的壓力下，其意圖藉此向國際社會宣傳不實訊息，以反制國際社會與海外疆藏獨組織對其殘害少數民族的指責，化解國際疆藏分離勢力對其形成之壓力（本會資料，1999.10.7）。

## 「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三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確認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發展，保持社會穩定；惟短期內問題癥結仍無法解決

「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三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召開，確認至公元 2010 年間加速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實施西部開發，積極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加強民族團結及共黨對民族工作領導，以維持社會穩定。惟大陸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相對落後，大陸當局在經建規劃上，均非著眼於當地人民利益，而是以國防、軍事、政治為目的，對蒙藏生活及經濟發展助益有限，且各民族在經濟權益、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方面仍有差異，摩擦仍存(本會資料, 1999.12)。此外泛土耳其主義份子及泛伊斯蘭主義份子等國際勢力滲入新疆地區與分離主義份子結合，益添民族問題複雜及敏感，短期內上述癥結問題仍無法解決。

## 大陸當局積極採取「西部開發」戰略，舒緩少數民族地區緊張

「第十五屆四中全會」強調加快開發大陸中西部(聯合報, 1999.12.2)。「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將「西部開發」列為其「十五計劃」重點之一。

1992 年中亞 5 國及高加索 3 國因蘇聯解體而先後獨立，在全球化趨勢下，與周邊地區發展貿易進行經濟整合的機會大增，為其西部開放發展提供契機。俄羅斯在此區勢力雖在逐漸淡出中，惟心有未甘。美國覬覦中東油氣資源，意圖壓縮俄羅斯在此區空間，制衡伊朗，從西部牽制中共；加以從西太平洋地區之日美安保條約及擬議中之「戰區反飛彈防禦系統」，似有左右包夾遏抑中共之勢(中國時報, 1999.11.20)。

西部地區相較於大陸沿海發展，仍屬貧窮。大陸當局為避免因貧生亂，除上述戰略思考外，積極西部地區開發，應有期達到經濟發展，舒緩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緊張及維持穩定的目的。

## 漢族移民威脅西藏文化

自 1959 年後，西藏反抗大陸當局統治行動被武力鎮壓後，超過 11 萬的漢族

官員被送到此區執行所謂「現代化」。西藏首都拉薩較 1950 年擴增 17 倍，尤以漢人聚集地區增長最快。隨著漢人移入，舒適的中式建築、卡拉 OK 歌唱廳(Karaoke hall)及妓院充斥西藏城市(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999.12.2)。大陸當局移入大量漢族正威脅著西藏傳統文化。

### **新疆貪污腐敗嚴重，影響經濟發展**

儘管大陸當局透過各項宣傳強調其對少數民族工作成就，意圖接受聯合國及世界銀行等機構的貸款和援助，改善當地生活。但很多款項都被北京及新疆層層官僚機構侵吞。現在新疆的幹部，不論是漢人、維族人，甚或其他族人，人人趁機貪污腐敗，私下口號是：「3 光政策」：吃光、搶光、分光。大陸當局並非不知情，但在其穩定第一口號下，只要新疆不從事分離運動，腐敗貪污短期內尚不易遭遇麻煩(自由時報, 1999.10.24)。

### **參考目錄**

1. 唐鈞，「中國貧困與反貧困形勢分析」，1999 年 1 版，汝信、陸學藝、單天倫等，1999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 陸建華，「1998—1999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總結報告」，1999 年 1 版，汝信、陸學藝、單天倫等，1999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 楊宜勇等著，失業衝擊波——中國就業發展報告，1997 年 1 版，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

